

编者按: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并发表题为《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重要讲话,随后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本届G20峰会主题是“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与会各方进行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对话,为新形势之下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向、构建新机制、注入新动能。

今年是G20峰会机制启动10周年。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首次G20峰会在华盛顿匆匆召开。接下来的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借G20平台合作应对危机,帮助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历经10年的发展,G20对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极有可能成为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可以说G20峰会面临着十年小考。

鉴于2018年以来世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逆全球化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贸易规则博弈更趋复杂等不利的国际环境,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能否在关键时刻凝聚共识至关重要。今年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六次出席或主持峰会,充分体现出中国对G20机制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的积极意愿。

本期推出“G20峰会”专题,回顾G20峰会10年来的发展历程,洞察世界发展趋势,把握全球经济大方向。深入分析习近平主席在此次峰会上的讲话所释放出重要信号,进而为新形势之下的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提供哪些新方向和积极作用。希望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G20峰会

- 02 G20峰会10年,世界变了多少?
- 05 G20十年风雨路,更需新征程
- 06 G20峰会将给全球经济“举旗定向”
- 07 从习近平G20金句看世界经济大势
- 08 G20: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的再出发
- 09 习近平峰会讲话阐释G20的初心与未来

经济纵横

- 11 读懂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潜台词

文化漫步

- 13 基因编辑婴儿是历史趋势还是偶然事件?
- 17 李宏图:阅读经典与思想历练

人物春秋

- 19 老布什:用压垮苏联那套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

悦读时光

- 封三 2019年度“国考”开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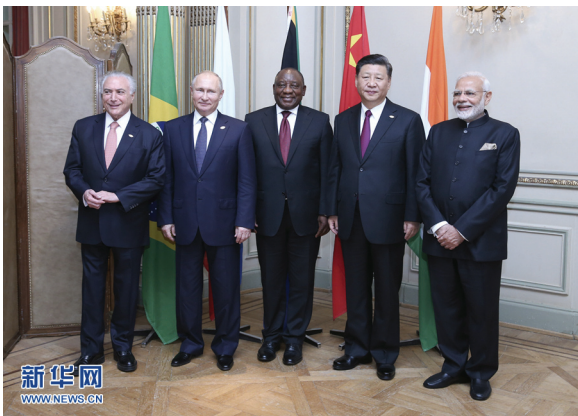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G20 峰会 10 年，世界变了多少？

阿根廷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下午，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闭幕，会议通过宣言，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题达成共识。今年是 G20 峰会机制启动 10 周年。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首次 G20 峰会在华盛顿匆匆召开。接下来的 10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借 G20 平台合作应对危机，帮助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客观来说，G20 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分歧一直存在。有人甚至总结说，10 年前，当 G20 峰会模式首次出现时，世界主要经济体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但 10 年后，世界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现实确实令人担忧，只是有哪个机制能比 G20 更有代表性？



回忆当年：危机下焦虑的西方

2008 年 10 月 11 日，在华盛顿，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正在进行特别会议。让人意外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突然来到会场。他同各国官员进行了 25 分钟磋商，承认金融危机已经从美国这个震中向外蔓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身陷其中”，小布什说，“我们对此严肃对待，并想同你们合作。”一周多后，即 10 月 22 日，在英法领导人催促下，白宫提出于 11 月

14 日-15 日召开 G20 领导人会议。要知道，筹备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期间还有美国中期选举，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之焦虑。

事实上，那个时期，从 G7(七国集团)到 G20，再到欧元区 15 国峰会，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一场接一场。但远远不够。11 月 15 日，首次 G20 峰会在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闪电般落幕，一脸疲惫的小布什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峰会很成功，富有成果。”其实，由于太过匆忙，首次 G20 峰会的宣言长达 5 页，但几乎没有什么具体措施，而且内部分歧明显，当时有媒体称简直是“20 国会议、20 种方案”。按一些人的说法，唯一新颖之处在于“20 国代替了 7 国”。这些领导人把具体措施的制定推迟到了第二年。时至今日，提起 G20 峰会，很多人会想到首次峰会召开时的仓促及当时形势的紧张。但从重要性上看，2009 年 4 月的伦敦峰会更受瞩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将其描述为“我们追求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伦敦峰会会场内外所释放出的信息，对于如今的世界依然不算过时。

《环球时报》驻伦敦记者对那次峰会召开时会场外爆发的示威印象尤为深刻。由于社会底层迸发出强烈的仇富情绪，超过 5000 名反资本主义人士、环保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在峰会当天上街示威。同以往的和平示威不同，部分人砸破银行门窗，入室破坏。也有人与警方发生推搡，意外身亡。为及时遏制骚乱，警方安排大批计算机专家监控脸书、推特等人气极旺的社交网站。当时的景象，在此后伦敦乃至全英各地举行国际会议时，都不曾出现。

为确保与会领导人的安全，英国在峰会筹备上至少花费 1900 万英镑，而安保费用就占了 720 万英镑。伦敦峰会还早早将议事日程清晰排列，正如今

任英国首相布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所列举的:从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衰退,到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到加大金融体制监管力度,以及给予欠发达国家援助,摆脱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峰会结束后,布朗在全球瞩目下宣布会议成果:各国领导人首次为世界银行系统制定规则,包括统一国际财务系统,为对冲基金等投资行为制定规则,结束“避税天堂”现象;同意在2010年底前投入5万亿美元等。布朗还表示,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将被“点名羞辱”,“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合作时代”。

10年转瞬即逝。英国原外交部次长马洛克·布朗日前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当年参与峰会的经历时感慨说,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在峰会上谈了10年,却始终不见解决。他还表示,G20峰会开了10年,各国在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缺乏足够的合作精神。马洛克·布朗所言非虚,但他的要求也许太高。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和加拿大前财长马丁被认为是G20的创立者,前者在回顾10年前的情形时说,“如果说金融危机期间还存在一线希望,那么G20的进一步制度化可能就是那道曙光……如果没有G20来召集(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世界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走来的路可能会大不相同。”

高光时刻:那些人那些事

“西方在国际秩序中力量的下降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让G7成了‘跛脚鸭’,无法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碍于各国之间的分歧,无法迈大步子”,汉堡国际政治学者佩纳·哈拉尔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相比较,G20峰会体现了各种优势,代表各方力量的平衡。”G20代表着全球2/3的人口,GDP总值占全球的85%。由于参与者还有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东盟等国家及各大国际或地区性组织,G20峰会更像一个世界大会。过去10年,每次峰会都达成共识宣言。

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要求在11月首尔峰会前完成IMF份额改革,同时为发达国家削减赤字和公债设定了量化指标和时间表。2012年的洛斯卡沃

斯峰会承诺致力于保增长、促就业,为确保IMF拥有足够资源应对世界经济的风险,不少国家宣布参与IMF的增资。

G20除了是论坛,亦是政治舞台,10年来,诸多国家及政治人物成为峰会的叙事中心。德国《明星》周刊称,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在任何峰会上都是主角,G20也不例外。不过,G20峰会上,美国总统的角色有些尴尬。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这标志着世界秩序的崩溃:奥巴马启动,特朗普加速。尤其自去年的汉堡峰会后,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美国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已经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则代表着新兴国家不断强大的力量。2008年的华盛顿峰会,国际媒体普遍称,人们对中国拯救世界资本主义期望很高。2009年的伦敦峰会甚至被称作“G-2”,意指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此后,中国的立场和举动一直深受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兴经济体在G20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金砖国家在每次G20会议期间都会聚会,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相对统一的立场。此外,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讨论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让G20突破了原有框架,不只讨论自己。

有意思的还有俄罗斯的角色。“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G20峰会上,西方经常企图孤立或让俄罗斯难堪。文章举例称,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举行前夕,时任澳总理阿博特表示,准备就马航MH17坠毁事件向俄总统表达强硬立场,他称要“抱摔”普京。那次,普京未待峰会结束便启程回国。

G20聚焦经济,但布里斯班峰会却是俄罗斯与西方僵持关系的缩影。“10年来,俄罗斯在G20峰会上表达的立场表明,西方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俄学者普拉托什金对俄罗斯“今日经济”说。2009年峰会召开后,英国《卫报》曾刊文评价与会方:奥巴马说“我们准备带头”,但问题是其他国家是否愿意追随;萨科齐在国际上是重量级选手,在国内却被憎恶;默克尔代表欧洲最大经济体,她对布朗和奥巴

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热衷;俄罗斯一向引人注目,但最终充当什么角色取决于其情绪。文章还列出只是“来尝免费甜点”的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印尼。

在 G20 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角色非常特殊,她可以说是唯一一位每次峰会都参加的领导人。为什么?正像她去年在汉堡所说,G20 峰会“不是关于帮助,而是关于自助”。“参加 2008 年峰会的一众领导人中,现在只有两人仍大权在握——默克尔和埃尔多安。”《卫报》今年在一篇回顾总结文章中,对当年与会的巴西前总统卢拉等众多人物一一点评。文章称,那些领导人中,如今有人身陷牢狱,有人卷入腐败指控。

未来挑战:马基雅维利咧嘴大笑?

“G20 峰会十周年值得关注,因为这 10 年间发生的变化令人印象深刻。”谈及 G20 峰会的特殊性,澳大利亚总理及内阁部副秘书长大卫·格鲁恩表示,所有 G20 领导人都参加峰会——几乎没有例外;即便一些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其领导人仍然参加会谈。

约翰·科顿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团队负责人,该团队对历次峰会作出的承诺进行追踪和评估。“峰会的第一个 10 年取得的成功还是很显著的”,科顿说,“当然,不完善之处也有,但即使在最核心的问题——‘成员国按照领导人的承诺做了吗’上,平均完成度也达到 71%。”

科顿认为,自 2009 年以来,G20 还实实在在地聚焦一系列社会议题并作出承诺。比如,2014 年的布里斯班峰会承诺在 2025 年前将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别缩小 25%;2017 年的汉堡峰会,19 个成员(没有美国)誓言支持就气候变化达成的《巴黎协定》。

当然,自始至终,分歧一直存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安德鲁·哈蒙德日前撰文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普遍视 G20 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管理的首要论坛,“然而,迄今为止,这个论坛尚未能实现一些人在危机高潮时赋予它的全部理想。一个关键原因是,它没有正式机制来确保执

行各种协议。”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曾刊文称,“G20 开了个好头”,但它正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质疑 G20 是否正在践行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最高论坛”的职责,一些峰会被描述为几乎没有任何实效的空谈。

对此,丁一凡说,过去 10 年,G20 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它首先担负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2008 年的金融危机,很多人士都认为不亚于 1929 年的大萧条,那次大萧条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次,G20 对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改革是通过 IMF 进行,但每次都是 G20 先达成共识,然后推行。

“在目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G20 峰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德国学者佩纳·哈拉尔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尽管峰会的决议不具约束力,但影响深远。一些 G20 措施已经转变为各国的法律。比如美国按照 G20 措施于 2010 年生效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此外,峰会的关键一环是各国间的双边对话,未来会更加重要,像“习特会”就是本次峰会的最大看点。

去年 3 月,在德国举行的 G20 财长会联合公报罕见地同意放弃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后,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说,这必须被视作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由贸易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核心理念。“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畏缩后退,马基雅维利(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的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咧嘴大笑”,文章感叹道。

在加拿大前财长马丁看来,“G20 在为好的目标而战。真正重要的是,它赢下了一些战役”。美国彭博社 1 日援引马丁的话说,如同 G20 财长会产生于亚洲经济危机,G20 峰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生,峰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发生危机,即便眼下问题在日益凸显。“当你要求从根本上处理眼前的问题时,就会对他们产生压力。就是这样。这就是创立 G20 的原因。” (2018-12-3 环球时报)

G20 十年风雨路，更需新征程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正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极有可能成为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时值 G20 峰会正式形成十周年，可以说面临着十年小考。回顾十年风雨路，未来 G20 更需踏上新征程，继续推动 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要平台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的讲话既指出了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也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作为 G20 的重要成员，一贯支持 G20 的发展，希望 G20 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鉴于 2018 年以来世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逆全球化回潮、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贸易规则博弈更趋复杂等不利的国际环境，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能否在关键时刻凝聚共识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指出，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深刻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十年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中，G20 峰会机制正式形成，这既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克时艰的产物，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往的全球经济议程主要由发达国家的 G7 组织主导，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份量显著增加，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灵、民主赤字等诸多问题，G20 取代 G7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历经 10 年的发展，G20 对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由于 G20 机制依然面临着权力政治的博弈，相关机制建设阻力重重，推动 G20 机制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此次 G20 峰会主题是“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实际上折射了“共识”的重要性，G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能否在关键时刻凝聚共识至关重要。

G20 未来将走向何方，取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趋势。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就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四点建议，表明了“中国方案”。一是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二是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回顾 G20 的历程，G20 峰会机制的形成是各成员国共克时艰的产物。目前，G20 和全球经济治理再次面临困难，各国应该继续发扬伙伴精神，加强在各领域中的沟通与合作。三是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只有通过把握科技革命的机遇，加强科技发展的经验和共享，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通过不断把蛋糕做大，才能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增益改革。四是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将发展作为解决诸多全球问题的“总钥匙”，也只有不断实现以发展为导向，诸多全球性问题才能够逐渐解决。

总之，在尚未找到能够取代 G20 的更好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之前，各国只有携手努力，在 G20 机制框架内不断加强协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作为 G20 的重要一员，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表明了中国继续支持 G20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明确态度，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多做些加法，多顾全大局、多包容互惠，众人拾柴火焰高，G20 才能在困境中不断前行，世界经济也才能不断实现共同发展。

（2018-12-2 光明网）

G20 峰会将给全球经济“举旗定向”

G20 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今年适逢 G20 领导人峰会机制启动 10 周年,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六次出席或主持峰会,充分体现出中方对 G20 机制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力量的积极意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秩序演进,此次峰会必将起到“举旗定向”的作用。峰会若能取得积极成果,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为 G20 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吴白乙认为,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新旧增长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G20 峰会应该发出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明确信号,推动国际社会一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G20 成员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去探索未来,这符合共同发展的大的利益格局。是高举贸易自由主义大旗,还是退回各自为政、以邻为壑,G20 峰会能达成何种共识尤为关键。

此外,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世界经济引擎之间将达成怎样的共识,也是此次 G20 峰会的重要看点。吴白乙表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于两国关系未来如何发展至关重要。中美两国要解决的不仅是双边经贸摩擦问题,还承担着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责任。目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波及到其他经济体,双方如果能够在峰会期间达成基本共识,努力构建更具有包容性、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制度和秩序,必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新的增长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习近平主席于 12 月 2 日至 3 日对阿根廷、巴拿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访拉美,也是习近平主席第二次访阿、中国同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巴。吴白乙认为,此次出访对引领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进一步优化中国外交在全球布局的重大举措。

吴白乙表示,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未来增长



的重要动力源,发展活力和潜力巨大。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 50% 以上。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支持。吴白乙说,“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最初并不包括拉美国家,但是拉美国家对这一倡议作出积极和热烈的回应,因此中拉双方进而取得将“一带一路”合作自然延伸到拉美地区的共识。发展中国家处于初级工业化或工业化过程中,有巨大的产业空白和基础设施缺口,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互补性显著,空间巨大。

阿根廷是拉美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阿建交 46 年来,两国关系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中阿关系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吴白乙表示,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阿一方面反映了阿根廷作为 G20 主办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为中阿高层密集互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通过国事访问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加快。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就中阿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规划,推动务实合作,双方有望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使得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

去年 6 月,中国和巴拿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巴拿马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新伙伴。中巴建交一年半以来,两国关系开局良好,双方合作起步快、效率高,在贸易、投资、海事、金融、基础设施

从习近平 G20 金句看世界经济大势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30 日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领、普惠共赢,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讲话赢得了与会国家的广泛认可,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共鸣。

世界经济,两大趋势

1、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

2、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深刻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以史为鉴,两大论断

3、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4、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正确轨道,四个坚持

5、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应该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赞成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循序推进,不搞

“一言堂”。

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各方应该坚持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的政策工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增长。

7、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

我们既要鼓励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要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重视教育和就业培训。我们既要立足自身发展,充分发掘创新潜力,也要敞开大门,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创新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8、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继续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落实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联合国框架内有关工作提供有力支持。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空间,支持世界经济真正公平发展。要继续支持非洲发展,帮助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进新工业化进程。

中国决心,两个目标

中国下决心将减贫进行到底,到 2020 年彻底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中国将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鼓励公平竞争,主动扩大进口。今后,我们将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中国市场。
(2018-12-2 央视网)

建设、人力资源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收获。吴白乙表示,中国与巴拿马的建交时间虽然比较短,但是两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强劲的经贸合作关系,许多中资企业已在巴拿马市场深耕多年。巴拿马在中美洲的地理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不仅连接南美和北美两个区

域,而且辐射到周边的加勒比海各国。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互利共赢合作,为中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筑牢基础,引领方向。

(2018-11-28 经济日报)

G20：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的再出发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本届G20峰会主题是“为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与会各方期待G20能够继续展现凝聚力和行动力，并对国际贸易等重要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对话，进而为新形势之下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向、构建新机制、注入新动能。

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世界格局变化

实际上，G20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是因为G20本身契合了全球发展的需求，并在全球治理中充分发挥了协调与平衡的作用。一方面，G20涵盖了七国集团(G7)等传统工业强国和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因而G20兼顾了不同国家及地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G20属于非正式的国际论坛，各国以非正式磋商的形式对全球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等议题开展建设性与开放性的对话，因而G20能从更为普遍性的视角对全球治理进行讨论与协商，具有较为灵活的实效性。

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世界逐步进入一个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并对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仍滞后于这一世界格局的变化，原有国际秩序也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这一失衡导致全球治理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不断扩大，全球社会由此面临着诸如增长乏力、发展失衡、共识赤字等发展困境，近期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次G20峰会尤其需要发出支持多边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明确信号，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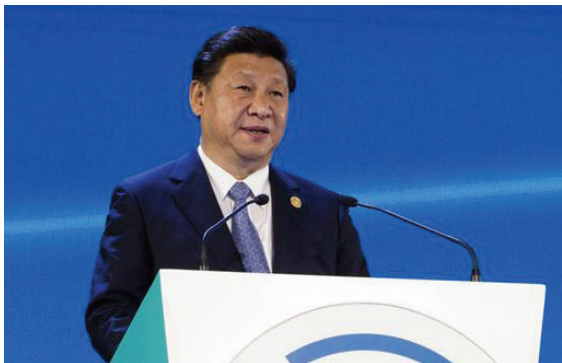
改善全球治理的四项措施

对于作为G20重要成员和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是基于实现自身发展和全球发展交汇做出的战略抉择。为此，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合作机制，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增长成果惠及全球，进而实现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的再出发。具体来看，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坚持多边主义，提高全球治理效用。多边主义不仅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增强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宏观政策协调的能力，从而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要加快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改革，在目标规划、议题优先项的设置等方面创造良性互动的条件，提高全球治理规则和政策的合理性。此外，通过设计更为灵活的规则，降低全球治理的制度门槛与行为成本，将更多行为主体纳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实现全球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提高



习近平峰会讲话阐释 G20 的初心与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二十国集团要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第六次开启“G20 时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是说。30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是南美洲历史上的第一次 G20 领导人峰会。习近平当天出席此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

全球治理主体参与的代表性。

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开放合作不仅是推动全球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因此,要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治理观,并坚持以自主、渐进和务实的视角完善多边合作关系,集中探索解决发展瓶颈的有效手段与路径。同时,构建多维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寻求建立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全球治理的横向体系及纵向生态的有效调和。此外,以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项目合作建设为主要内容,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与服务为重点,带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开放合作新格局。

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切实提振将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因此,要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和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扩大全球创新交流合作的领域和区域,营造效率与公平兼容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生态,及时调整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全球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提升全球整体的创新发展能力。此外,建立可控的

产业生态体系和风险管控机制,在减少企业全球运营的潜在风险的同时,着力防范技术、产业创新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新风险。

坚持发展导向,实现全球普惠发展。实现全球发展成果的共享是国际社会的应有道义责任。因此,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全球社会协调发展,集聚、整合与统一各国参与全球治理重组的各项努力,实现全球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同时,充分利用全球治理中的多元机制与平台,凝聚各方在宏观经济政策、基础设施融资与技术变革治理等重要议题上的共识。此外,进一步谨慎务实地稳健推进现行全球治理规则和全球治理平台的增量改革,坚持双边、地区与多边层次的治理机制并重,破除地缘政治博弈的外溢与国际霸权主导的惯性对全球治理的桎梏。

全球治理转型与升级的再出发,需要各方继续坚持合作互利与协调共治的 G20 精神。相信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之下,G20 一定能够继续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也一定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

(2018-12-1 光明日报)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周年，也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0 周年。”一如习近平开篇所说，这两个“10 周年”启示着本次峰会是一次关键节点的关键会议。发轫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 G20 峰会应危机而生。回望过去，习近平说，10 年来，我们同舟共济、戮力同心，推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深渊，走上了复苏增长的轨道。如其所言，10 年来，G20 领导人定期会晤，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举旗定向，G20 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各方面发挥重要顶层设计作用。

而今 10 年前的那场危机虽已过去，但世界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深刻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增加。“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应如何抉择，考验各国智慧。讲话中，习近平阐释 G20 的初心和未来，呼吁各成员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他指出，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面对重重挑战，我们既要增强紧迫感，也要保持理性，登高望远，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不要因为走得太久，而忘记为何出发。应危机而生的 G20，要把好世界经济航向更需秉持初心。

在访前于阿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写道：“携手引领世界经济在正确轨道上发展，既是二十国集团成立初心所在，也是二十国集团最重要任务。”30 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重申 G20 的初心：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共同需要催生了二十国集团。他强调，10 年后，我们应该再次拿出勇气，展示战略视野，引领世界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走过 10 年，在经济全球

化和多边合作遭遇逆风之际，G20 可否再次化解危机？走过 10 年，G20 应如何走向未来？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讲话中用“四个坚持”作出明确阐释：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

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合作。在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杭州、汉堡，习近平在 G20 会议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彰显着中国智慧。而今次习近平在阐述“四个坚持”时，不少话语再次在 G20 多边外交舞台上留下中国印记。5 年前，习近平第一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呼吁共同维护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此次，习近平谈及坚持开放合作时说：“现在看，这一任务更加迫切。”

数据显示，二十国集团成员间月均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比半年前翻了一番，2018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可能下滑 0.3%。习近平就此强调，我们应该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循序渐进，不搞“一言堂”。“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伙伴精神曾指引二十国集团走过国际金融危机风雨，习近平在 G20 会议上亦多次强调伙伴精神。此次，习近平在当天讲话中再度指出，“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二十国集团成员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克时艰。”

十年同舟路，今朝再起航。此次峰会的主会场位于拉普拉塔河畔。在甫抵阿根廷之时，习近平提及这条河时说，“我愿同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各方一道，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引领世界经济的航船，从拉普拉塔河畔再次扬帆起航，驶向更加广阔的大海”。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 时间”展示的“中国主张”，将为引领世界经济航向注入新动力。

(2018-12-2 中国新闻网)

读懂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潜台词

“一场晚宴，中美各表”，中美元首 G20 会谈举世瞩目，而会谈的初步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中方媒体报道，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在具体层面上，中美双方将探讨从扩大市场准入到保护知识产权，避免强制技术转让，再到共同反对网络窃密等一系列共同关切的问题。

美方发布的声明意思也很明确：美方原先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明年 1 月 1 日后仍维持在 10%，而不是此前宣布的 25%；中美双方将在 90 天内展开谈判，如届时不能达成协议，10% 的关税则予以提升。此次会谈的最大成果在经贸共识之外，还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暂时遏止住了中美两国今年快速滑向新冷战的危险趋势。

立场

首先，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增强中美关系。这一核心立场贯穿始终。特朗普正式就职不足 3 个月，2017 年 4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时，就明确表达了保持和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看一些当时的表述：“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 4 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

2017 年末特朗普访华时，中方与美方签订了总额高达 2500 亿美元的双边经贸合作协议，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所以，有些网上舆论声称是中国抛弃“韬光养晦”而把美国从朋友逼成敌人，就当真是



辨黑白了。然而美方还是发动了对华贸易战，一举刷新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历史记录数十倍，令国内外高度担忧中美可能由此全面走向对抗。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此担忧尤为强烈，毕竟这是其不可抗的系统性风险。但遗憾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10 月 4 日和 11 月两次发表鹰派色彩浓烈的讲话，忧心也终于冲破了峰值。此次会晤之后，王毅外长说得明白：“中美两国元首当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会晤中同意，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搞好。双方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础的

中美关系。”再考虑到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领导人似乎颇有默契地始终保持着个人友谊，中美领导人对将中美矛盾冲突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倘若有人一定要把新冷战强加于我们，我们有足够勇气迎击挑战，基于实力和社会凝聚力对比的分析也赋予了我们足够信心；但和为贵，通过平等、理性的谈判对话避免中美新冷战，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幸事，贸易战以来将近 9 个月的较量情况也创造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条件。

成果

这次中美会晤在经贸、国际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首先，会晤实现了中美贸易战休

战。这里要注意,是“休战”,而非“终战”。虽然两国元首达成了停止加征新关税的共识,但并没有取消此前双方各自加征的关税,而且停止加征新关税有3个月期限。中方表述提到,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的方向是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但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来双方团队具体技术性谈判结果不能达成共识,美方仍然有很大概率开始加征新的关税。

其次,在这场元首会谈中,中方比较成功地引导了按中方主张的原则达成解决经贸分歧的共识。在5月份中美经贸磋商发布联合声明之后,我曾总结出我方不可退让的三大底线:1.以中国扩大进口的积极主张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不是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极主张;2.没有设定美方当初提出的“中国削减两千亿美元贸易顺差”指令性计划指标;3.没有扼杀《中国制造2025》,维护了中国追求产业升级、自我发展的权利。从这一次中美双方的表述来看,即使是完全按照美方表述,双方的共识也是以中国扩大进口的积极主张缓解贸易不平衡,这条途径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美方声明中提到,中方表态愿意批准以前未经批准的高通(Qualcomm)收购恩智浦(NXP)交易。高通收购恩智浦案堪称近年全球芯片业界最引人瞩目的并购案之一,已获得美国、欧盟、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全球八个主要监管部门同意,唯有中国政府迟迟没有放行,高通为此将完成交易的时间延期三次,从最初设定的4月25日延至7月25日,本来中方监管部门对这一交易的审查时间到10月14日才结束,但鉴于今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的形势,高通于当地时间7月25日宣布放弃了这一交易。现在,中方表示,如果高通-恩智浦收购案再次提交,中方愿意批准。

从这条信息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是通过这个举世瞩目的场合,中方含蓄地向世人宣示了自己通过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等渠道对许多国际经贸交易拥有域外管辖权。其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进口替代型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与生

产。但有关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明白,贸易战带来的这个时间窗口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延伸,务必抓紧时机,快马加鞭,尽快赶在时间窗口关闭之前投产,抢占市场先机。

不仅芯片等信息技术产品,汽车等产品也是如此,在这场贸易战爆发之初,我就提出,这场贸易战与中国大幅度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相结合,可能会给中国吸引IT、汽车等产业投资创造良机。前几天,通用汽车已经宣布在美加等国大规模裁员、关闭工厂;由此也希望各地、各部门和各企业、投资者抓住时机,大力发掘贸易战危中之机,发展是硬道理。

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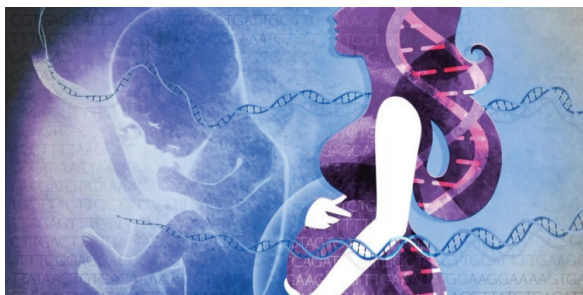
这场贸易战休战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政治都是好事,中美两国人民可以为此过个好年,全球股市可借此喘息站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轻易指望中美贸易战结束,我对中美贸易战“总体战+持久战”的整体判断不变,而且我们仍然必须做好防范极端情况的准备,即“美国向中国全部对美出口加税+美国经济萧条”叠加冲击。

因为美方的不少主张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却企图通过“自己生病、别国吃药”来解决,不可避免要与中方发生矛盾。如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其本质是国民储蓄过低的体现。整理计算一下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便可得结论如: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这样的国民储蓄率差距,决定了无论中国如何扩大从美国进口,美国贸易逆差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美国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还会加剧这一问题。

按照美方表述,如果接下来双方团队具体技术性谈判结果不能达成共识,美方仍然会加征新的关

基因编辑婴儿是历史趋势还是偶然事件？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成功诞生了一对经过了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婴儿，引爆全球舆论，同时也触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弹。对此行为如何评价、后续如何处置，已经有许多意见（例如“知识分子”和“赛先生”的系列报道），本文不做过多讨论。但围绕这一事件产生的许多不同观点，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贺建奎事件的第四种声音

如果我们只从技术角度思考，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其实早已“水到”，只不过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其“渠成”。从发明 CRISPR 技术到 2015 年中山大学成功在人类胚胎上实现基因编辑（之后胚胎被废弃），科学界业已清楚，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

因编辑、并产生携带这样基因的个体，是技术上基本可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实现 CRISPR 技术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难度并不大，任何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都可以在数十万元的成本之内实现这一技术。低难度，低成本，同时又有潜在的高回报（出名和利益），即使没有贺建奎的工作，很有可能也会有其他人在最近做成这件事，甚至可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只不过是秘密地。如果在此之前，科学界尚没有强烈的危机感的话，那么现在应当真正提高警惕了。

讨论在人体上实现基因编辑、并使这种编辑可传递给后代，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1）可以做，并且当前存在的风险值得一冒；（2）不可以做，但在当前的风险解决或者清楚之后可以再讨论（实际上，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倾向于最终可以做的）；（3）不可以做，即使解决了技术风险也不能允许。这三种观点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其分歧主要在于不同观察者对这一问题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认知不同。在事实层面上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技术风险；在价值层面上看，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存在着操作层面上的医学

税，特朗普政府也完全有可能重演他们已经一再表现的“弃约精神”，以下因素还会加大他“弃约”的概率：先是美国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的阴云已经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倘若成为现实，很有可能激励美国政府进一步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紧随其后，特朗普的政敌们难免加倍努力利用贸易战给特朗普“挖坑”。经过中期选举，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在各方面给特朗普找茬，寻求“欲加之罪”。对此也仍不可放松警惕。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打打谈谈”会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我们需要习惯这一新的环境。与此同

时，着眼于中国长期发展的需求，在这场史诗级贸易战中，我们也应当用两种眼光来审视美方的作为：斗争对手的眼光，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新兴主导大国的眼光。用后一种眼光来审视，就是要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抉择是重要的，教训是可以吸取的”。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才能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以致错失良机、陷入困境。

（2018-12-3 海外网）

伦理问题,其结果还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伦理问题。

对上面两个层次的态度不同,就会导致不同人的观点差异。认为风险不足虑、伦理不足畏,则持第一种观点;重视技术风险,但不太关心伦理、或者认为伦理问题会变化,则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基因编辑自身的伦理问题不可克服,则持第三种观点。从理性讨论的角度上说,上述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界持后者居多,但也有一些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例如贺建奎的潜在合作者们。在任何形式的实践开始之前,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充分讨论,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

但除了上述三种观点之外,目前的舆论场中还存在另一类观点,并且在一般公众乃至非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很是流行。它们把实现对人类可育后代的基因编辑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贺建奎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推崇到引发技术革命乃至“精神原子弹”(例如:赵南元,2018)的地位,认为应当予以鼓励和继续发展,而人们对旧时代旧伦理的维护将在时代车轮之下被毫不客气地摧毁。果真如此吗?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底是什么?

人类演化和文明进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这其中有坦途,有革命,有停滞,也有倒退。不同的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曾经提出过无数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描述和预测,它们有的被证明是错的,有的尚未实现,有的目前还在被人们思考。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来不是由哪一个人所代表的,更不是由哪一个人所命名的。“时势造英雄”,英雄是顺应时势的人。

人们津津乐道的科学技术史故事是,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代表的技术革命冲破了旧时代生产力的束缚,哥白尼、达尔文、普朗克打破了保守势力和陈旧观念对科学理论的限制。但这种叙事并不意味着一切冲破现有束缚和限制的行动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看到反叛和破局就去点赞,这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革命来自反叛,但违规不都是革命。事实上,历史发展中更大规模、更常见的情况

是大量离经叛道、打破常规的事件和风潮经历大浪淘沙、最终销声匿迹,被原有的伦理和规则纠错。魏晋名士服用五石散,以为可以身轻得道;二十世纪初的猩猩血清抗衰老疗法,一度名噪一时;迷幻药LSD至今仍有不少拥趸为之摇旗呐喊……历史的试错比试对多得多。

那么,什么样的事件不是试错、而是真正的“革命”呢?从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共同特点总是从科学共同体扩散到公众的,知识界首先完成范式革命和转移,之后才是公众接受和广泛传播。换句话说,成功的科技革命的确要经历打破常规的过程,但是是通过内行点赞、外行反对的方式把常规打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不是与开普勒、第谷争论,而是与教会抗辩;支持达尔文的是赫胥黎与华莱士,反对达尔文的是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不一而足。反之,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科技革命是内行反对、而外行点赞的。须知,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上,专家的判断力可以说总是高于非专业人士的。那种认为“外行比内行看得清”的观点,无非是“高贵者最愚蠢”的反智主义当代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科技革命真的发生,一般也都在发生的当代也经过了长期的周密分析和判断,在合乎时代背景的伦理范畴中实现了革命性变化,而不是像“革命”这个名词所暗示的那样饱蘸血与火。人们爱举蒸汽机代替人力机械、铁路代替马路、计算机代替算盘来说明新时代的技术对旧时代生产方式的冲击,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技术进步始终在当时代的道德、法律和伦理范畴之内活动,同时并未真正导致当时代不能承受的经济社会危机。蒸汽机、铁路、计算机取代了人力机械、马车夫、算盘手之后,这些工种消失了,但背后的劳动力却被转移出来从事新的、更有效率的工作,这恰恰是其解放意义的体现。家庭作坊的纺织女工擦干眼泪之后,第二天是去工厂报名应聘,而不是呆在家里接着哭泣。那些造成了巨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创新事件,也都得到了后来的积极纠正。航海大发现带来了欧洲经济

的繁荣,也造成了殖民主义和黑奴贸易。这一历史事实是对当代人正视科技危险后果的警示,而不是值得未来效法的先例。

因此,那些高喊着“历史的车轮就要碾过来啦”的科技革命“预言家”们,往往不能够正确认识到他们所关注的事件在历史中所处的真实地位。对一个未经事实和实践充分检验的可能试错大加鼓吹,可能会以极小的概率押中宝,但至少靠这种鼓吹丝毫不能增加其成功的渺小可能性。

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我们是否应欢欣鼓舞?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了。那种“科技发展总是给人类整体带来福祉”的观点,往往隐含着一个人令人胆寒的假设:不能接受这种福祉的人类都被淘汰了。诚然,物种进化中存在着淘汰和筛选,某种程度上还是十分“残酷”的,但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应当主动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答案业已被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为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发生,绝不应该是在损害某些人、造福另一些人的前提下开展的,更何况盲目开展的结果很可能是损害了人类整体。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是在规避了种种风险之后才被人类踏足的,那种看到太阳升起就欢欣鼓舞的想法,未免是没有读过《摩诃婆罗多》和《创世记》(注一)的后果。

科技革命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从技术的角度看,可能有以下三个层次的风险:(1)技术本身的已知和未知问题,造成现实的伤害或错误;(2)技术被错误利用、被无限放大,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3)技术和科学观念的发展对原有伦理、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社会混乱或其它后果。

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则兼而有之。对于第一类风险,科学界论之甚详,主要包括: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系统存在的脱靶等问题可能导致漏改、误改、错改基因片段;即使编辑技术足够精确,我们尚未完全了解人类基因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以及各个基因所扮演的全部角色,仓促编辑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不可控的变化;即使上述二者都不

存在,对天然物种基因库的干扰仍然可能存在,也会造成未知风险;等等。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在天然情况下便已经存在,例如人类基因有 1.2×10^{-8} 每代每碱基的天然突变速率(Scally, et al., 2012)。但基因编辑技术是定向(相对天然)地改变人类基因组,本身是有目的的,即使不谈目的是否正确,至少应当在技术上保证目的准确达到,而现在尚不能做到。况且,艾滋病的亲子阻断技术已经很成熟,进行基因编辑本来并不必要。这类“增强功能”型的基因编辑实践本身就会引发人们对其是否会破坏平等与公平的担忧。

第二类风险和第三类风险过去主要是生物伦理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但贺建奎的工作无疑让科学工作者也对这些问题增加了思考。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的诞生,是一场瞒天过海之计。生命科学界应当警醒,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有着较为全面的法制建设和较为正常的学术共同体的国家,如此重大的实验居然可以躲过来自高校、医院伦理委员会、地方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学术共同体内部等诸多视线的观察,公开完成,并且几乎没有花费过多的成本(据贺建奎在香港的报告,每个胎儿花费是28万)。如果这样的技术应用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国家或组织(例如恐怖组织或极端种族主义者)那里,改造的基因是更加不可控制的基因,贺建奎的行动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它们在现实性上是完全可行的。这并不是滑坡谬误,而是实打实的可见危险。

历史发展中真正的风险:无视风险

基因编辑技术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不仅仅是医学技术上的伦理问题。后者已经有很多分析(邱仁宗,2016),例如如何对胚胎进行基因操作、编辑之后的责任如何认定、胎儿出生后的医疗责任和社会问题如何应付等。这些固然是重要的伦理问题,也是基因编辑技术的诸多困境之中值得考虑的,但它们还都限于技术层面,容易被“技术发展会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回应化解。基因编辑带来的深层伦理问题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也即福山所谓的“后人类时

代”(福山,2017)的问题。由于现代生物学向人们揭示了一幅以基因为人类个体本质的画卷,对基因进行编辑便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主观操作。这种操作是否意味着个体的自主性受到了威胁,是否意味着人类已经“僭越”到自然界之上,是否意味着未来判断自主性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例如亲子关系)会发生彻底改变,都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在生命伦理学界,对于是否应当解禁生殖系的人类基因编辑以及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王翠平,2018),并且不乏学者(陶应时等,2018;田野等,2018)提出化解困境的方案、为推动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张本。应当认识到,风险本身是一个事实判断,是有和无的问题。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风险有还是无,是一个可以判断真假的命题。当然脱离了历史时空没有抽象的伦理,因此伦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也并不刻意要维护什么旧伦理。但必须牢记的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不能以某些我们现阶段不能承受的成本为代价。例如,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或淘汰为代价。这其实是历史发展中真正最大的风险:无视风险。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基因编辑相关伦理当前面临的状况是非常紧急的。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直接把问题抛到了台面上,已经容不得我们再做慢条斯理的伦理学讨论了。生物学家和生命伦理学者正在行动起来,思考自身的伦理建设和规范教育,以提供这一领域更加明确的学术规范共识和准入制度。除此之外,高等教育机关、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当完善相关的监督审查机制,特别是对于有资本流入和利益输送的研究项目更要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早产的婴儿”说明了科学共同体对此类高风险事件缺乏明确的预判和应对,其实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在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早期就为人们敲响警钟,提醒研究者尽早探索相关风险的应对策略,同时思考如何防止技术扩散和被滥用。

勿用科幻指导现实

当下还有一部分紧迫的任务是需要加强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对于大部分非专业人士来

说,这一公共事件强烈冲击了他们对基因编辑的认知,此时科学共同体必须及时发出理性的声音,使得公众尽快明白基因编辑技术当前面临的风险和困境,并与社会一道探索其中伦理问题的化解。我们注意到,在贺建奎的背后有着多重势力参加到整个研究进程中,例如一些商业资本和政治诉求,这些都是来自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力量。他们之所以牵涉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拜之前对基因编辑的错误理解所赐。这种风险将来还会不断产生,并且可能越演愈烈。

迷信科学的能力、以致于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与怀疑科学的可靠、以致于排斥现代科技,是一体双面的迷思,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缺乏科学应有的理性与怀疑精神的社会大众中是广泛存在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群众心理诉求更加剧了这两种倾向。这或许是因为什么在中国诞生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的某种背景因素吧。

在讨论此问题的大众语境中,刘慈欣的《天使时代》(注2)影响很大,但如果从基因编辑技术的角度审视,这个故事的假设还有可商榷之处。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家们要想解决粮食和生存问题,首选的方案应该是改造作物与土壤,而不是改造人类。前者基本上不会有伦理问题,而后者确实存在困难和冲突。放着现实可行、风险很小的道路不走,一定要在条件和时机都未成熟的情况下冲破现实伦理束缚,这不是时代先锋,只是莽夫之勇,甚至可能是野心与阴谋在背后作祟。当然,《天使时代》这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而那些拿着小说当现实、指导现实的言行,就更加显得荒谬了。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戒慎恐惧,这不是懦夫的胆怯,而是智者的谦卑。科学共同体要思考自身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同时更要引导大众的思考和行动,后者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显得更加重要。只有我们真正认清了风险,才能在荆棘丛生的莽原上开辟出未来发展的大道,而不是一头扎进未知的深渊。

(2018-12-1 知识分子)

李宏图：阅读经典与思想历练

笔者从事近代欧洲思想史研究，这一专业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和当代思想史学者进行对话，而且更需要阅读和领悟历史上诸多伟大思想家的著作。阅读经典，对自己的思想成长是一种高强度的锤炼，让自己的阅读不再局限于知识层面，而是从原先的固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久而久之，内化成为自己的价值观，转化成自己思考学术、理解世界的一种视野。因此，回顾个人的阅读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思想价值观念进行“知识考古”的过程。

在数十年间的读书生活中，很多著作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作为历史学研究者，这里还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展开。

首先应该是1978年进入大学读书开始，坦率地说，进入大学之前，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真正开始读书是在大学。沉浸于当时刻苦学习你追我赶的学习环境，更受惠于老师们的敬业奉献，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学的是历史，但却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受当时任教的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张芬梅老师，一位是阎飞老师。前者是位认真严谨关爱学生的好老师，教授世界近代史；后者作为刚刚入职的青年老师，教授政治经济学。受到两位老师的引导，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很厚重的大书，但竟然也被我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完。与此相配套，我还阅读了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等书籍。可以说这些书，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锤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培养了我思考问题的视角，直到今天，我依然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宏图

“社会”有着浓厚的兴趣，实是由于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大学毕业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后，导师尤天然教授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对现代化理论和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兴趣，也成为了自己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这一阶段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则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聚焦于社会转型和政治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讨论一个国家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与此同时，当然也读过当时风靡的关于现代化的很多著作，例如美国学者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以及国内学者罗荣渠先生、钱乘旦老师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著作。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学术关切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思考“政治”的现代性。

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由于我的导师王养冲先生和副导师陈崇武教授主攻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欧近代思想史，我重点转入欧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王先生为我们开设“法国革命史”和“西欧近代社会学思

想史”两门课程。正是这样的机缘,让我接触到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革命,已经有很多论著,例如阿伦特的《论革命》也是一本经典。但我特别喜欢托克维尔,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深邃,还因为他所独有的那种情怀。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贵族家庭,1859年去世,年仅54岁。每当后来上课向学生介绍其生平时,我都对托克维尔的早逝感到悲哀,真心觉得这样的天才思想家如果能多活十年,可能会留下更为丰厚的思想遗产。特别是如果他能够活着看到1871年巴黎公社这样一场革命时,他将又会如何思考?

托克维尔的一生著作虽然不多,但每本都是经典。1835年30岁时出版《美国的民主》一举成名,5年后出版了第二卷,并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1851年出版《回忆录:1848年革命》,对刚刚过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进行反思。1856年去世前,也是积20年的思考后,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解释法兰西民族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一生主要写就了上述三部著作,其中就有两部是关于“革命”的问题。为什么他特别钟情于“革命”这一主题,难道他是希望一个社会不断地进行“革命”?其实,托克维尔并非是希望革命,而是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在法国历史上这两次革命才能理解法国社会的历史和未来走向。的确,托克维尔一生着力分析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法国在从贵族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实现权利转换的过程中非要通过革命来进行。

在我的思想史学习和研究中,特别是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我特别欣赏“剑桥学派”,尤其是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他的书很多,我也主持翻译过他的一些著作。我特别崇尚他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这本书。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是200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作访问学者时,这本书虽然很薄,但却给了我一种震撼,我被斯金纳天才性的洞察力和解析力所感染,后来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现在很多学者将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视为经典,对此应无异议。不过要论对问题探究的深入与犀利,概括和凝练,以及方

法论上的示范,我还是独独钟情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这本书是1997年斯金纳在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时所作的讲演,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以英国革命中的共和主义者为中心来考察了“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自1958年英国思想家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观点后,“消极自由”的概念被普遍接受。而“消极自由”的核心就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不受外在的阻碍即为自由。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斯金纳教授并不赞同伯林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研究方法上,不是过多地纠缠于概念的分析 and 逻辑的推演,而是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重新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由此,在两种自由观之外,斯金纳发展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另外,这本书的方法论也非常有价值,它通过系谱学的方式,在最初概念起源的论争之中,或者说通过重新进入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来进行质疑并激发人们重新思考我们目前所接受的那些思想观念的唯一性。

其实我还喜欢很多书和很多思想家,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曾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作访问教授,这里不仅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也是亚当·斯密等一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曾经的任教讲学之地,这次访问使我结识了一批学者如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J.贝瑞教授,加深了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解。再有,我也十分热爱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我将他和法国的托克维尔、德国的洪堡列为19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三杰”,他是提倡个体性、将自由主义从政治维度转向社会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他的《自传》等书都是我的必读书目。

我自己觉得选择读哪些书和很多要素密不可分,例如老师的引导、自己的思想取向等等。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同样,读什么样的书会决定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8-11-27 南方周末)

老布什：用压垮苏联那套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

94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2月1日去世。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亲身参与过二战的总统，也是整个冷战历史的高位见证者、助美攀上霸权巅峰的施政者。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人生经历，也许会对今天的美国乃至世界格局有所感悟。



成长

上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老布什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十七岁少年。在他基于保家卫国热情选择参军的同一时期，美国也有了从英国手中彻底接过世界霸主权杖的机会。美国的巨大工业能力造就了一头战争巨兽，与一战中在关键时候入场下手“扳动天平”不同，二战中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已是同盟国方面获取胜利的主因。待战争结束，终成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美国与二号强国苏联，通过雅尔塔体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很快，美国和苏联因社会价值观根本的不同开始了一场人尽皆知的新的战争。“毁灭人类文明于旦夕间”的核武器几乎同时为两国所掌握，因忌惮同归于尽，美、苏之间的角逐主要是依靠军备竞赛、军

事对峙、政治攻势等手段进行，只有在无关双方核心利益的第三世界，才放手让自己的“代理人”进行实体战争。因而这一场较量也被叫作“冷战”。二战中一度战功卓著，被授予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布什，在战后曾有过一段从商经历，但很快便效仿其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弃商从政，于上世纪60年代冷战的高峰期，踏入美国政坛。

一边是父辈历任美国参议员的雄厚政界人脉，一边是豪富母亲家族的财力支持，这位“战时英雄”不久就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履历中布满了从“议员”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条目。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原本可能被任命为驻英、法大使等显赫职务的老布什，毅然选择了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一职。

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虽然缓和，且因冷战势头逼人的苏联而开始了部分合作，但毕竟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这个相当于非正式大使的职务，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承担着何种重任、又会面对何种敏感和复杂的形势可想而知。而老布什确实有着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与韬略，他不仅完美处理好了工作任务、为中美关系进一步转暖做出贡献，并且获得了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内一致认可，卸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之后，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最后当上了美国第41任总统。

对华

在老布什从政的早年间，冷战高峰期美苏激烈对峙、美国因越战失败而转入守势、八十年代里根上台“重振美国”一一发生；而当其走马上任美国总统，

果断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和“世界新秩序”理论，又使得美国爆发出新一轮强大的政治经济攻势，苏联最终自我瓦解。正是在老布什的任期前后，美国登上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巅峰。

然而，美国虽成了冷战的胜利者，却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其时的美国面临高债务赤字、高外贸逆差、高失业率，人均GDP增速下降、制造业生产下降、经济竞争力下降等种种危机。可惜老布什未能正确评估美国自身的问题，仍然热衷于趁机接手“苏联遗产”，发动海湾战争、出兵索马里，试图建立完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军事行动胜多败少，美国社会也到了忍耐的极限，最终老布什在连任竞选中败给了一个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学生运动领袖，克林顿。

但作为政治家，老布什所拥有的远见仍是克林顿难以比拟的。在任期内，他洞察出了苏联和中国的不同，因而对当时的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虽然中美关系在此期间不无波折，可是仍没有偏离合作的主流。老布什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生命力决定了美国用对付苏联那一套“一视同仁”是不可能奏效的，而从军事上压垮中国更是近乎空想，如果美国将冷战的对象由“苏”转“中”，那么其自身也必陷入灾难性境地。

继任的克林顿虽来自民主党，但就任后在对华关系上经过短暂的调整和试探、吃过苦头之后，还是基本继承了老布什留下的对华接触与合作战略。可以说也是基于这套源起老布什的、对华策略的助益，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磨合而转入稳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千年初期，既是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在二战后最为繁荣的时期，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曾经的“黄金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

承继

当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秉承父志再次踏入白宫的时候，美国历史上诞生了第二对“父子总统”，布什家族自塞缪尔·布什开创的基业也终于达到了巅峰。不过“高处不胜寒”，天下大势起伏涨落，于个人、家族也是若此。小布什刚刚接手的美国不仅“超

级大国”的地位全无撼动，克林顿时期信息技术革命也让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再一次找到增长空间；与此同时，美国的价值观似乎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道德高度”的吸引力。

可是小布什没有吸取其父在某些方面的教训，反而走的更远。他错误地高估了美国对世界的掌控力，甫一上任就对他国肆意而为。过去数十年美国的中东政策已在伊斯兰世界埋下愤恨因果，在小布什这里，炸弹炸响了；奈何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其又接连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终于让美国陷入至今难以挣脱的泥沼。

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当时已颐养天年的老布什在对华关系上对自己的儿子面授机宜，还是自身几经利弊权衡，小布什政府最终也采取了对华缓和态度，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确轨道。再之后，奥巴马接替小布什执掌白宫，除了忙于收拾烂摊子基本无暇他顾。而此时的老布什虽然英雄未改本色，年逾古稀仍然四次跳伞庆生，却难以挽回自己家族在政治上的颓势。

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内预选，老布什的次子，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虽然担任过佛罗里达州州长且声望尚佳、在党内颇有根基，但是面对高举民粹大旗汹汹而来的特朗普，毫无抵挡之力便早早出局。也许杰布·布什并非全然缺乏一个合格美国总统的能力，而是逃不过其父兄的历史旧债阴影。

小布什与老布什

今天，老布什带着战争英雄和政治家的光环远去了。而他身后的美国虽还是超级大国，一切却又不同。今天的美国社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分裂，共和党代表的保守势力似乎有了重新兴起的势头，以“美国第一”为纲领的特朗普不仅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强烈单边主义，对华政策也变得危险而不可捉摸；而民主党一方则走的更远，文化多元主义迅速走向极致，少数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和非常规性倾向者也纷纷踏入政治圈。随老布什而去的是他个人的辉煌，那么，美国的未来呢？

（2018-12-1 佚名岛）